

引言 民族精神與百年夢想

我們這本書，是專講近代以來中國人的追夢歷程的。這個夢，就是專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因此，這個追夢歷程，也自然要從 1840 年後這個復興之夢的產生與興起開始講起。

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務實的民族，也是一個充滿理想與奮鬥精神的民族。

在中華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中，夢想與追求，夢想與奮鬥，夢想與挫折，夢想與抗爭，夢想與勝利，從來就是緊緊連在一起的。夢想越崇高、越偉大，付出的犧牲就越巨大。

中華民族是一個酷愛和平的民族，一個崇敬道義的民族，一個追求天人和諧的民族。中國人自古以來崇拜道義，而非強權；崇拜智者，而非強者；崇拜祖先，而非上帝；崇拜包容，而非零和。

對美好社會理想的憧憬與追求，而非對強權、霸主的崇拜與追求，在中華民族的夢想中，居於核心地位。

遠古以來，中國就流傳著“女媧補天”“羿射九日”“神農嘗百草”“精衛填海”“愚公移山”等傳說，代代相傳，家喻戶曉，滲入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化作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基因的一部分。這些傳說生動地告訴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人不能沒有夢想，不能沒有追求，但夢想與追求的實現，離不開奮鬥，哪怕是捨生取義、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辭。

農耕文明形成以降，《周易》中便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些思想告誡後人，不能因循守舊、坐享其成，而要自強不息，在順天應人中化成天下，實現遠大抱負與理想。

先秦時期，中華文明經過漫長的積累過程，出現了一次偉大的思想覺醒，對後世中華文明走向產生極其重大的影響，中華文明的思想元素開始真正具有了“中華”特色。在諸子百家豐富多彩的思想中，對人與社會關係、人與國家關係、國家與民眾關係有了深刻反思，提出多種多樣的社會理想。如孔子對“禮”“仁”的倡導，老子對“道”“無為”的推崇，墨子的“兼愛”，孟子的“仁義”，莊子的“萬物齊一”，荀子的“禮義”等等，奠定了中華民族在社會理想中對“天人合一”“人間正道”“和諧友善”等的不懈追求。這些積極進取的思想，既是為當時社會動盪、階級分化狀況尋找出路的客觀反映，也為秦漢時期形成一體多元的統一多民族封建國家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

漢唐以後，以儒家為中心、包容多樣、博採眾長的中華民族思想文化格局形成並發展，進一步形成了以“大同社會”“小康社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為代表的社會理想，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華民族子孫砥礪前行。

這些社會理想，在中國近代國運式微、制度腐敗、內憂外患頻仍、動亂戰亂不已的情況下，難以為中國找到救亡圖存、革故鼎新的新出路與新道路，難以真正解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歷史性新課題。但是，在中國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馬克思主義指導、社會主義道路並取得成功後，這些社會理想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標誌，在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向強起來跨越的征途中，依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基因。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 2014 年 9 月 24 日在紀念孔子誕辰 2565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中所說：“儒家思想同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記載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在建設家園的奮鬥中開展的精神活動、進行的理性思維、創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重要滋養。中華文明，不僅對中國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且對人類文明進步

作出了重大貢獻。”¹

他在講話中列舉了中國古代形成的許多重要思想，今天對治國理政、道德修養、精神文明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增強民族團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這些思想包括：關於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關於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關於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關於以民為本、安民富民樂民的思想，關於“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關於“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思想，關於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思想，關於經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實踐的思想，關於集思廣益、博施眾利、群策群力的思想，關於仁者愛人、以德立人的思想，關於以誠待人、講信修睦的思想，關於清廉從政、勤勉奉公的思想，關於儉約自守、力戒奢華的思想，關於中和、泰和、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相處的思想，關於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

對於 5000 多年從未中斷過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來說，對於歷經滄桑與磨難而始終歷久彌新、保持旺盛活力的中華民族來說，對美好社會理想的追求，就是不斷激勵其從災難中奮起、在厄運中抗爭、在戰亂中聚合、在挫折中前行的巨大精神力量。

正是有對美好社會理想的不懈追求，中華民族才能不斷勵精圖治、革故鼎新，緊隨時代前進的步伐，從原始社會走向奴隸制社會，又從奴隸制社會走向封建社會，再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苦難深淵中躍出谷底，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終於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康莊大道。

這種對美好社會理想的不懈追求，深刻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既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撐，也是中華民族的精神稟賦，使中華民族在 5000 多年艱難曲折的文明史中形成了偉大的創新精神、奮鬥精神、團結精神、夢想精神，成為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強大精神動力。

這種對美好社會理想的不懈追求，深刻地決定著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

1 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 2565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 頁。

建社會的根本走向，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根據自身經歷最終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馬克思主義指導、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文化基因。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追求，有每個時代的發展邏輯與發展主題。中國近代以來，對美好社會理想的不懈追求，集中地表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要實現民族復興，就必須完成徹底擺脫歷史厄運、贏得中國革命勝利、大踏步趕上時代潮流這三個歷史性跨越。

中華民族要想徹底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厄運，實現“小康社會”和“大同世界”的理想，就要進行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民主革命。

中國革命要取得勝利，面對強大的敵人和“一盤散沙”的民眾，就要有大公無私、兼濟天下、以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為己任的革命階級和革命政黨。

中華民族要想大踏步趕上時代潮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要建立起適合本國國情的良制善法，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成功的基礎上，不斷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

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繼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和精神追求，從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幸福、民族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成為團結帶領中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領導核心與民族脊梁。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不斷取得勝利的過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就是同中華傳統文化精華相融合、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發展和不斷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延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有著深厚的中華歷史文化基因，凝聚和接續著中華民族對美好社會理想的不懈追求。

奉獻給廣大讀者的這本書，就是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之際，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已經實現、開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繼續前進之際，完整地回顧 1840 年以來中華民族經歷的奮鬥與夢想，中國人所經歷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追夢歷程。

第一章 前所未有之大變局

1840年6月下旬，英國一支艦隊來到中國廣東珠江口外，宣佈封鎖廣東海口。持續兩年零兩個月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當時的人誰也未曾想到，這場在中國大門口爆發的侵略戰爭，竟揭開了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中華民族屈辱史的序幕。

對这一幕降臨的原因，後人常用一句話來說明：落後就會捱打。也就是說，中國當時被動捱打的重要原因，是中國落伍了。

對此，我們還要追問一句，中國落的是什麼“伍”？

中國落的，不是世界霸主地位的“伍”。因為，儘管長期以來中國在世界上處於經濟文化發展的領先地位，國力強盛程度在世界上也首屈一指，但由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處的特定發展階段所決定，由中國歷史文化的特質所決定，由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奉行的基本國策所決定，中國從來沒有謀求過世界的霸主地位。這一點，與古代的羅馬帝國等迥然不同。

中國落的是什麼“伍”呢？那就是在西方國家已經開始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佔據統治地位之“伍”，是英國等國已經開始了的工業革命之“伍”。

既然落伍了，就要迎頭趕上。這就提出了民族復興的歷史任務。但是，西方列強用武力打開中國國門的目的，絕不是要喚醒一個潛在的競爭對手，而是要永久地佔領一個廣闊的海外殖民擴張市場。這就決定了中國不能跟在西方屁股後面，重走西方列強資本主義發展的老路。中國要想實現民族復興，只能探索另外的道路。這是後話。

這裏，我們還是回到最初的話題，中國為什麼會落伍呢？這主要不是因為西方列強的強大，而是中國封建社會自身發展的結果。

這要從清朝“康乾盛世”說起。

“康乾盛世”與強弩之末

清朝出現的“康乾盛世”，儘管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強盛的重要時期，但已是“強弩之末”。與以往歷史上的盛世不同的是，就在這一盛世中，已經出現了衰敗的徵象。中國古代的文學名著《紅樓夢》，已經深刻地揭露了這些徵象。只不過當時的統治者與世人，還被盛世的表像所迷惑罷了。

歷史現象，很多時候不僅是複雜的，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康乾盛世”就是如此。

首先我們要說，“康乾盛世”是名副其實的盛世。

——奠定了中國現在版圖的基礎。經過 70 餘年戰爭，擊敗準噶爾部，平定了西北回疆，隨後又穩定了西藏。在北方，給向黑龍江流域進犯的沙皇軍隊以重創，通過《尼布楚條約》（1689 年簽訂）鞏固了清廷對東北地區的控制。清朝的統治疆域，在乾隆時期達到全盛，北起外興安嶺，西逾蔥嶺，南至瓊州，東至黃海、東海，成為當時世界上少有的幅員遼闊的東方大國。

——封建皇權統治空前鞏固。清朝沿襲明朝強盛時期的中央集權制度，又加以發展。雍正時期，設立軍機處，削弱內閣權力，進一步加強了皇權。所有政治軍事經濟大權，集中在皇帝手中。皇帝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能對他加以限制的，唯有皇太后。皇權的加強，既是封建政治制度從中央官僚體制向皇權專制政體發展演變的結果，也是統治集團內部強化滿族貴族統治的產物。

——農業恢復，經濟發展，市井繁榮。順治時期，叫停了引起民怨的八旗貴族“圈地”“投充”¹。康熙時期，大力獎勵墾荒，改革稅制，與民生息，還撥款治理黃河、海河。到康熙六十年（1721 年），全國墾田達 735.6 萬餘頃。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增加至 780 萬頃。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各省

1 清八旗一般不從事社會生產，在京畿地區圈佔大量田地後，強迫失去土地的農民為他們進行生產勞動，被稱為“投充”。

大小男婦共計 2 億零 40 萬人。

與此同時，“康乾盛世”又是名副其實的“敗絮其中”。誠如蕭致治先生在《鴉片戰爭史》中所言：“川、鄂等五省白蓮教大起義雖可視為清王朝由盛到衰的轉折點，然而它的衰敗卻肇始於乾隆中期。從乾隆中葉起，土地集中，剝削苛重，吏治腐敗，武備廢弛，矛盾激化，衰敗現象已明顯地表現出來。而土地集中、經濟衰敗則是導致清王朝走下坡路的基本問題。”¹

——土地兼並嚴重，社會矛盾凸顯。據乾隆十八年（1753 年）統計，宗室貴族、勳戚世爵所領莊田共為 153366 頃，遠遠超過閩、桂、滇、黔等省的民田數目。故乾隆時湖南巡撫在奏疏中說：“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²實際上，開墾荒地得到的土地，多數落在了達官貴族和鄉紳手上。土地高度集中，使大量農民背井離鄉，農村勞動力減少。農業生產的萎縮，又使耕地面積減少。嘉慶十七年（1812 年），全國耕地共有 7915251 頃。道光十三年（1833 年），降至 7375129 頃，21 年間減少了 54 萬多頃。

——“文字獄”成風，造成嚴重的思想禁錮。清代文字獄，集中發生在順治、康熙、雍正、乾隆時期，持續時間之長，發生案件之多，株連之廣，超過封建統治的歷代王朝。龔自珍曾作詩《詠史》，對清代“文字獄”作了無情的揭露：“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八旗子弟分化衰敗，戰鬥力大大削減。康熙時期，八旗和綠營就已亂象迭出。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左都御史王鴻緒在奏摺中說，駐防將領佔奪民產，重息放債，強娶民婦，“種種為害，所在時有”；駐防旗兵，紀律敗壞；綠營提鎮，縱兵害民，虛冒糧餉，不一而足。³至乾隆中期以後，八旗與綠營更是每況愈下，軍紀敗壞，訓練廢弛，將士驕惰，軍營奢靡。乾隆

1 蕭致治主編：《鴉片戰爭史》上冊，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32 頁。

2 蕭致治主編：《鴉片戰爭史》上冊，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33 頁。

3 轉引自蕭致治主編《鴉片戰爭史》上冊，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5 頁。

五十九年（1794 年），乾隆皇帝最後一次南巡，在杭州檢閱營伍。據當時記載，“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墜地”¹。

——吏治腐敗，奢靡之風蔓延。從乾隆中葉起，清廷上下的腐敗已十分嚴重，成為清朝國運迅速衰敗的重要原因。和珅的腐敗盡人皆知，已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清朝貴族的奢靡，更是突出，既影響到官員的腐敗之風蔓延，也影響到社會的奢靡之風氾濫。儘管乾隆皇帝也大加整飭，因貪污處死的二品以上官員即達 30 人之多，但腐敗之風愈演愈烈，上至大學士、軍機大臣，下至州官、縣官和幕僚書吏，無所不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乾隆皇帝多次南巡，最初的用意，也有視察河工、體察民情的意思，發展到後來卻成為皇帝遊玩揮霍、官員藉機搜刮民脂民膏的勞民傷財之舉。

——邊民暴動與農民起義不止。清朝統治時期，不僅有尖銳的階級矛盾，還有複雜的民族矛盾。兩者相互作用，到乾隆中期，已經開始釀成民變，暴露出“康乾盛世”積累的深刻社會矛盾。在此之前，雍正至乾隆年間，先後鎮壓了貴州苗民起義，平定了四川大小金川部落，耗費了大量精力。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發生的山東王倫起義，揭開清朝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序幕。隨後，又出現甘肅回民起義、台灣天地會起義等。直至嘉慶皇帝即位，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白蓮教起義，成為清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因此可見，“康乾盛世”與以往每個封建王朝的盛世有很大不同，它不是王朝走向興盛的標誌，而是清王朝乃至整個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的“拐點”。正是“康乾盛世”，將中國封建社會進入衰敗時期後深刻的社會矛盾與制度弊端充分暴露，為鴉片戰爭引發的全面社會危機與統治危機埋下了隱線。與此同時，還嚴重扼殺了正在東南沿海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這種深刻的社會矛盾與制度弊端，正是導致中國逐漸落伍的根本原因。

在鴉片戰爭前後直至整個清朝滅亡，清朝統治者在處置內憂外患中的種種表現、種種作為，與清王朝在“康乾盛世”中形成的封建統治傳統及統治思路，有著極為密切的淵源關係和因果關係。剪不斷，理還亂。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康乾盛世”時落伍於時代潮流

1 轉引自蕭致治主編《鴉片戰爭史》上冊，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6 頁。

之後的根本原因所在。正是中國封建社會制度發展到了後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輝煌與強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封建社會獨特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適應並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社會繁榮，並且使這一輝煌與強盛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使中國封建社會具有極強的自我修復能力的重要原因。

然而，也就在西方列強先後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之時，特別是英國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之時，中國封建社會及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度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為嚴重束縛和阻礙中國社會先進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障礙。清朝統治階級也隨著中國封建社會進入腐朽的後期，日益喪失其剛剛入主中原、建立新的封建王朝之時的朝氣與銳氣。等待著他們的，將是一個內憂外患同時襲來的大變亂時期。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這是龔自珍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寫下的《己亥雜詩》之一。既表露出時人對清廷的失望與憤懣，又表達了對重振中華的渴望之情。

“日不落帝國”的崛起及侵華野心

也正是在這時，一個在工業革命中崛起的資本主義強國——英國，正在透過印度殖民地，用貪婪的目光，虎視眈眈地遙望著中國。

16、17世紀，英國還是一個農業國。英國的商人以經營呢絨出口為主，在新航路開闢的刺激下，開始經營遠洋貿易。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這一情況發生根本性改變。

1688年“光榮革命”¹後，英國政府長期奉行重商主義政策，一方面刺

1 1688年，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發動推翻英王詹姆士二世的統治、防止天主教復闢的非暴力政變，史稱“光榮革命”。1689年，英國議會通過限制王權的《權利法案》，國家權力由國王逐漸轉移到議會。英國君主立憲制政體由此起源。

激國內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另一方面鼓勵資本主義海外擴張。以此為背景，英國國內的毛紡織業與圈地運動相互推動，迅速發展。

然而，英國的毛紡織業在 17 世紀遇到了印度和中國棉紡織品的有力競爭。為保護本國的棉紡織業，1700 年，英國國會通過了禁止棉紡織品進口的法令。也恰在此後不久，以 1733 年發明飛梭為標誌，在棉紡織業中誕生了一系列的革命性變革，最終導致了 18 世紀 80 年代以蒸汽機為代表的動力革命。這就是在英國首先發生的工業革命。正是第一次工業革命，使英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並取得海上霸主地位。

我們來看這組數據：（1）製造能力：1820 年，英國工業總產量為世界工業生產總額的 50%，對外貿易佔世界貿易總額的 18%。1830 年，英國原煤產量佔世界的 70%，布疋和鐵產量均佔世界的 50%。1820—1850 年間，英國的五金製造佔世界的 40%。¹1850 年，英國擁有的蒸汽機總功率為 129 萬馬力，佔歐洲總量的 58.5%。²（2）國家經濟實力：1760 年，英國國民生產總值為 9000 萬英鎊。1800 年，增加到 1.4 億英鎊。1860 年為 6.5 億英鎊。100 年間增長 6.2 倍。³

重商主義在英國長期居於主導地位。而工業製造能力和商品生產能力的迅速提高，海上霸主地位的確立，進一步刺激了海外殖民擴張慾望。

此時，在中國周圍，英國已經控制或染指了印度、新加坡、緬甸、伊朗、阿富汗等地，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也在荷蘭、西班牙等的控制之下。中國作為一個在西方人眼裏的富庶的東方古國，此時成為西方列強垂涎欲滴的“圍獵”對象。

其實，英國早已開始了各方面的準備。

1 《中國近代史》（第二版）上冊，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6 頁。（〔美〕戴維·羅伯茲：《英國史：1688 年至今》，魯光桓譯，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1—92、215 頁。——該書原註）

2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世界歷史》第 5 冊，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49—150 頁。

3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世界歷史》第 5 冊，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0 頁。

就武的一手來說：1637 年 6 月，英國艦隊闖入中國珠江，炸毀了缺乏戒備的虎門炮台；1808 年，英印總督以保護貿易為名，派艦隊在澳門強行登陸；1838 年，英國海軍少將馬他侖率軍艦駛入廣州內河。

就文的一手來看：1792 年，英國派馬戛爾尼使華，向清廷提出增開通商口岸、在北京設立商館、在舟山附近小島設立貿易商站等要求，被拒絕；1816 年，又派阿美士德使華，繼續提出貿易要求，也遭到失敗。

此外，1832 年，英國“阿美士德”號船隻到中國沿海，測繪地圖，搜集情報。

對上述事件，如果只取其中一兩件孤立地看，似乎只是一般的中西貿易往來。在這些商談與處置中，也充分暴露了當時的清朝統治者居安自賞、妄自尊大的愚昧。但偶然之中孕育了必然。如果把這些事件前後聯繫起來，特別是放在英國經歷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後，急於要在海外尋找更大市場的背景下去看，不難得到這樣的結論：自 18 世紀末開始，英國已經把下一個殖民擴張的目標鎖定在中國。

這一時期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手段，主要是殖民掠奪與商品輸出。由於有 17 世紀英國毛紡織業遭遇中國棉紡織品競爭的經歷，英國深知要打開向中國市場進行商品傾銷的大門，必須找到一種特殊的商品。而自 1600 年以來經營東印度公司的經驗，以及打開中國市場的種種嘗試，使它很快找到了鴉片貿易這把對付中國朝野的“利器”。

任何一種有問題的商品，由它的輸入演變成爲社會問題，是要有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鴉片也不例外。

鴉片輸入中國，由來已久。據文字記載，至少在唐代，罌粟已傳入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一直把它視爲藥材。鴉片作爲毒品在中國開始傳播，要追溯到明朝萬曆年間。到了清朝道光、咸豐年間，吸食鴉片之風在官員與民間流傳，最終演變爲嚴重的社會問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明清之時到了封建社會的後期，封建制度的弊端與社會矛盾日益顯露。人們面對這種種制度問題、社會問題又無計可施，不少有識之士漸漸心灰意冷。誕生於這一時期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便是這種社會窘境的藝術縮影。加之當時清廷的文化禁錮政策，更使士大夫階層的許多人感覺思想苦悶、報

國無門。在這樣一種由封建社會後期所造成的壓抑的社會氛圍中，人們不僅需要精神鴉片的寄託，也需要從鴉片獲得自我麻醉。

自 1800 年清廷頒佈嚴禁外商輸入鴉片、禁止國內種植鴉片的禁令後，嚴禁鴉片實際上成為政府官員同英美鴉片商人之間的一場博弈。而更嚴重的是，在社會每況愈下的背景下，內外鴉片走私者相互勾結，鴉片走私之風與鴉片吸食之風日甚一日，由社會問題演變成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的財政問題。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清道光帝採納嚴禁鴉片的主張，派欽差大臣林則徐於 1838 年 12 月赴廣東嚴查鴉片。1839 年 6 月 3 日至 25 日，林則徐等在廣東虎門海灘當眾銷毀繳來的大量鴉片，令囂張一時的英美鴉片販子為之一懼。在此之前，同年 5 月，林則徐下令解除封船，恢復正常貿易，要求進口商船出具甘結，保證不再向中國販運鴉片。這使禁煙運動於情於理都站住了腳。

鼓動英國商人拒絕做出不販賣鴉片保證，致使兩國貿易中斷的，不是別人，正是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他一面阻止英國商人出具甘結、恢復貿易，一面向英國政府遊說出兵報復。在林則徐禁煙期間，他還在 1839 年 3 月 27 日，以英國政府名義發佈一則公告，要求所有英國商人交出手中的鴉片，並保證“本總監督，為了不列顛女王陛下政府並代表政府，充分而毫無保留地願意對繳出鴉片的全體及每一位女王陛下的臣民負責，轉交中國政府。本總監督特別警戒所有旅居廣州的女王陛下的臣民，不論是英國人所有的鴉片的貨主，或是託管人，如在本日六時以前不將該項鴉片繳出，本總監督即行宣佈女王陛下政府對該英商所有的鴉片不負任何責任”¹。這實際上把中國政府同英國鴉片商之間的問題擴大成了兩國之間的矛盾，為發動鴉片戰爭埋下了伏筆。

1840 年 4 月，英國議會通過了發動對華戰爭的決議。在此之前，同年 2 月，英國政府已任命喬治·懿律為侵華英軍總司令、英國全權代表。

特定的語彙及特定的含義，都是在社會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在西方國家殖民掠奪的語彙中，“通商自由”或“貿易自由”就是這些國家憑藉船堅炮利

1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 1 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7 年版，第 254 頁。

與廉價商品打開落後國家大門的武器，在那些落後國家的眼裏，這些語彙其實就是殖民擴張、殖民掠奪的同義詞。只有在經過長達一個多世紀之久的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西方國家的舊有殖民體系土崩瓦解之後，才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通商自由”或“貿易自由”。

對華侵略戰爭，是由英國的殖民擴張野心所決定的。這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實質，也是發生這場戰爭的根本原因。至於戰爭以什麼樣的口實、在何時、藉什麼樣的導火線發生，那要由歷史的具體發展而定，其中不排除各種偶然因素起作用。

有一種說法，這場戰爭全是林則徐禁煙惹的禍，似乎是中國人“自招其辱”。

這裏實際上顛倒了戰爭發動的因果關係。前面的歷史過程已經說明，是英美商人大肆走私鴉片在先，清廷派林則徐嚴厲禁煙在後；林則徐一邊禁煙一邊恢復正常貿易，義律阻撓英國商人具結恢復通商、蓄意發動侵華戰爭。如果把前前後後的歷史過程聯繫起來看，清廷在當時的所作所為，沒有超出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正常行使主權的範圍，也沒有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會放任毒品走私而撒手不管。以清廷嚴禁鴉片為藉口，並把禁止毒品走私的正當行為稱為“阻撓貿易自由”，發動對華戰爭的正是當時的英國殖民主義者。

當然，林則徐的禁煙儘管轟轟烈烈，伸張了中國的國威。但這場禁煙運動是註定會失敗的。除了中英雙方實力對比懸殊的客觀原因之外，很重要的是行使國家主權的恰恰是一個正在走向末路的封建王朝。清廷的極度腐敗，高官們普遍的昏庸無能、避戰求和，使林則徐等愛國官員遠無回天之力，只能抱恨終生。第一次鴉片戰爭，最終以林則徐被革職發往新疆，關天培等戰死沙場，清廷被迫同英國侵略者簽訂以《南京條約》為代表的第一批不平等條約而告結束。這也是歷史邏輯所使然。

百年民族屈辱的開始

1842年8月29日簽訂的《南京條約》，一個最引人注目的條款，便是中國割讓香港島給英國。從此開了每每令中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先例，也